

论黄平 新理性批评的精神世界

赵毅衡

DOI:10.14065/j.cnki.nfw.2015.03.011

我对年龄代感觉迟钝,可能首先是阿Q式的忌讳,想忘掉自己是一件怕被人鉴定年代的古董。经常,听见年轻人在讨论谁是哪一代,谁又比谁高一辈低一辈,觉得他们无事生非:都是小孩。因此,首先声明一个偏见立场:虽然黄平的书从封面到章节标题都大书“80后写作”,我老气横秋地表示一点不同意见:半个世纪后,当这一代接近了我的年龄,哪怕黄平那时雄辩能力比今日更上几个层楼,也难说清“80后写作”是什么意思:正如我们回望五四一代,谁能记得鲁迅是上一轮的80代,在钱玄同、刘半农心目中是“老头子”?

“80后写作”,包括80后的作家与批评家,生在20世纪80年代,那段历史比较特别,但是这是出生年代,不是开始发挥社会功能的年代:作家凭感觉写作,辍学罢考是光荣使命,一般在二十岁开始写作生涯。因此,“80后写作”的作家,在世纪转折的几年开始写作,批评家不然,没有神童批评家,学问靠积累,学位靠苦读,文笔靠磨炼,见识靠切磋。这些80后批评家,要到2010年后,才开始一生的荣耀。两批80后写作者,实际上相差近十年,合称一代会有很多不便。其实黄平他们也知道“80后”这个名号本就是被年轻的创作群体所垄断的,要在他们的批评与郭敬明等的小说电影中找共同点,是刻舟求剑。

出身年代并不重要,思想成型的年代才重要。幸好,这一代写作者,在新世纪头十年一头一尾,先后升起。有的行业中称为“千禧一代”(Millennial),很高尚堂皇,千年一遇的幸运儿;有的职业中称为“新世纪代”(New Ager),金色冠冕,满是梦想希望。写作这个手艺却不同,这一代的写作者觉得自己生不逢时,落入了一个非文学时代,非批评岁月,用黄平自己的话来说,如今“文学批评成了边缘的边缘”。给一个大词做帽子,反显苦涩。由此,我看到了一个新的批评群体,一个新的批评立场的诞生。我个人认为这种“新世纪批评精神”,可以称为“新理性批评”,虽然这个词需要一系列的修饰,才不至于导致误会。

黄平,以及黄平他们,最大的特点是认真,他们的批评有一种拒绝当代蝇营狗苟的姿势,不满于中国文艺盛行的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一是嘲弄一切的犬儒主

义,二是随波逐流的享乐主义。他称郭敬明的《小时代》小说与电影系列为“最卑下的浪漫主义”,因为“拒绝历史责任”,假充年幼不愿长大。在“郭韩优劣论”的讨论中,我还没有见到如此旗帜鲜明的评价,不过《小时代》风靡全国,青少年景从滔滔天下,黄平如此振聋发聩之言,倒也不为过。

黄平对当前傲慢的无历史感的一代有一种鄙视态度,要求有历史责任,要坚守一种时代精神,反对精神麻木或犬儒混世。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他坚持称自己为“80后一代”,而不是“新世纪代”的原因。黄平他们并不生存在80年代,他们生存在中国从未有过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时代。黄平说:“80后一代有深刻的历史性,只是这种历史性只有从妥帖80后的理论框架才可以发现。”他们代表当代青年中一种精英主义的思潮,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抵抗的新文艺思潮”,哪怕这种思潮“长期缺乏必要的研究和命名”。

这种思潮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但同时黄平明白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崇高被当作宏大叙事被消解,主体精神成为碎片化,理想只是一种解构对象。在这样的时代,如何坚持崇高的历史感?

在这里,就出现了“新理性批评”不同于以往各代的特殊立场。黄平的主张一以贯之,那就是“戏谑美学”,用讽刺的冷水喷上火热的思想,让蒸汽变成动力,成就一种“特殊的艺术抵抗策略”。但是这样的立场不是凭空产生的,据黄平自己说,在当代文化中是有重要的案例可供分析的:

青年文化艺术作品的单子是:“周星驰的电影、王小波小说、《大史记》系列、《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网瘾战争》。”

“戏谑美学”的代表人物单子是:“80年代的王朔,90年代的王小波,新世纪十年的韩寒。”

当代作家的单子是:“路遥、张爱玲、王小波。”因为“他们直接击中各自读者群体的情感结构:路遥之于城乡迁徙大潮中的青年,张爱玲之于都市化以来小资—白领的青年,王小波之于渴望寻求‘自由’的青年”。

把这几张单子叠合一下,可以发现唯一的重合点只有一个人:王小波。王小波成为黄平“新理性批评”知

识谱系的轴心,不可能是偶然的。黄平对王小波情有独钟,因为王小波的精神世界是“理性加艺术”,最好地体现了黄平所坚持的“戏谑的历史感”。王小波精神的关键词是“理性”,在一个完全反理性的时代中寻找理性,坚持理性。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战斗,但又是一个不可能胜利的战斗。

例如,王小波写“文革”,写中国历史,情节匪夷所思:《黄金时代》写批斗会,《革命时期的爱情》写武斗打死人,都是用一种嬉笑顽皮的腔调。难道文化大革命真是玩笑一场吗?我们免不了要疑问:这些知青未免日子过得太逍遥,可以耽迷于发明杀人武器,专心致志“搞破鞋”,可以逃亡进山,可以捉弄队长。哪怕无穷无尽写交代,至多不过是“像个专业作家”描写性爱,批斗时虽然被捆得紧,松了绑还可以“继续犯错误”。这样的狂欢情节,在“文革”中不可能发生,尤其不可能发生在被批斗对象身上,我们体验到的“文革”酷刑,完全无法写成如此酒神式狂欢叙述。王小波写的“文革”,完全是扭曲历史。

在这个方面,王小波不仅为新理性批评提供了精神,也为之提供了方法:他不屑“反映现实”,他鄙视“历史事实”,但是他比任何作家都洞察中国文化的真正运作规律,比谁都更了解中国历史的运动方式。他讲故事的确嬉笑冷嘲,他的语言狂放恣肆,这种嬉笑冷嘲远远不仅是为了增加讲故事的乐趣,王小波面对的对象过于荒唐,荒唐到你认真对待它,跟它讲理,实际上是让自己弱智到对手的水平。

同样,黄平面对的也是一个不可能胜利的战斗:在一个非历史的时代坚持历史的责任感。这使命是注定要失败的,黄平对此有很清醒,他说他心里有着“失败者的自觉”,他在做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小时代,文学艺术中充满了浅薄无聊,把鸡毛蒜皮小事儿小便宜当幸福,在这个时代黄平坚持的是“无人应和,沉寂落寞”的理想精神。只要有这一点坚持,就让我们对文学批评的新一代充满希望。

这种新理性批评,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理性主义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而更表现为反讽精神。在这个时代,如果知识分子只是孤芳自赏,那还能独善其身,放弃责任;但是愤世嫉俗地挑战风车,一味居高临下训示,像克尔凯郭尔笔下的黑格尔一样“用国王般的眼神瞥着列队等候检阅的各种现象”,也一样是放弃责任。这时候,反讽就是一种有效的面对时代的方式,是在非理性中坚持理性的立场。贯穿着反讽的批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文化状态;理解了掌握了反讽的根本品质,就可以在沉溺中找到救赎之路。

实际上,文化的大环境,也让反讽成为唯一有效的社群意义方式。笔者从80年代起,就把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相关符号表意活动的总集合”。当代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向,社会各种人、各个阶层或集群之间,意见冲突不可避免,而且随着人的意识自觉,冲突只会越来越加重。用黄平的说法就是:“当年的政治共识在当下已经破碎……不同知识传统之间对话的能力越来越弱,立场决定一切。”

在这样的时代,表意的冲突只能用“联合解读”的方式处置,联合解读即是反讽式理解。要取得社会共识,矛盾的意见不可能消灭,也不可能调和,只能用相互矫正的解读来取得共识。黄平曾经引用过笔者的一个看法:当代文化的特点是,人之间的联系不再基于在部族—氏族的身份相似性(比喻),不再基于宗法社会部分与整体的相容(提喻),不再基于近代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阶级认同(转喻),当代文化的基础是消费,人与人之间形同陌路,没有生活方式的联系。

要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社群意识,就只有在不同意见中互相阅读对方的意见。妥协也只能是暂时的,意见冲突又会在新的地方出现,但是一旦反讽矫正成为文化惯例,文化就有取得动态共识的能力。

反讽精神在当代,由于媒介技术而取得了新的紧迫感:纸面的传播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在网络上读到作品,也在网络上读到批评。网络文化是一个喧闹的广场,人与人的空间隔断,身份遮蔽,说话少顾忌而多张扬,个个在亮剑,冲突公开而言辞激烈。而网络的共时特征,让他们的意见几乎无先后地进入对抗。文化表意的主要方式就是争论,这就让人觉得冲突过于激烈,社会正在危机性地裂解,其实这是互联网这种传播交流方式造成的印象。

但是“媒介即信息”,当今的交流,不是为了取得一致意见,而是在冲突中协调。网络社群是反讽的,最后以各种局部问题上的妥协,取代合一的形而上思想。在一个非社群化的社群中,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不必强求一致也能找到必要的共识,这就是反讽。

既然反讽已经成为这个文化的主调,我们就只有尽可能了解反讽的种种特点,包括其弱点与长处,以及反讽演化的出路,才能找到能让文化新生的表意形式。新理性批评的笔尖对社会精神的表态,形式上越来越复杂,却也更加贴近真实。我们可以想象,王小波这位电脑写作的先行者,如果在今日的互联网时代发声,会成为“反讽理性主义”的领军人。

黄平在“王朔—王小波—韩寒”这个文学脉络中得到了反讽精神的坚持,我们在黄平的批评文字中,看到

这个自称失败者一种神气清朗毫不畏缩的理性精神,一种在“戏谑”中找到批评主体立足点的自信。因此,黄平的批评时时冒出一一种昂扬自信的抒情基调,像地心的热量喷出的间歇泉,比如他借对于《繁花》的分析讨论现代人的意义危机,“从这些现代世界的罅隙里,永恒的光才会透进来,让不成熟的、病态的现代自我与更大的价值相遇……星光铺就的道路重新出现于天宇。”

黄平论文的这段诗意可以读作黄平自我评价,像王小波那样“诗意地创造自己,将自己从污浊的历史中脱离出来”,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新理性批评的前景。■

【注释】

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黄平:《反讽者说:我看“80后,怎么办”》,载《今天》2013年冬季号。

黄平:《反讽、共同体与参与性危机——重读王朔〈顽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期。

黄平:《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载《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

黄平:《从“传奇”到“故事”——〈繁花〉与上海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4期。

(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中期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3&ZD123)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 ——张定浩文学批评印象

郜元宝

最

早我是通过《文汇报·笔会》知道张定浩的,那时他正在《笔会》陆续发表谈《诗经》的潇洒轻妙的随笔,主编周毅女士如获至宝,逢人说项,我赶紧找来拜读,果然不同凡响,以为大概出于古典文学专家之手,但周毅说此君乃现当代文学出身,就毕业于复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阶段师从现代文学史和批评史专家许道明教授,毕业后东游西荡,后来才转入吴亮主编的《上海文化》杂志社做编辑。

那组谈《诗经》的随笔后来结集为《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诗人》出版,他自称这是“某种为己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目标”。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足见他的兴趣所在确实是古典文学。但不久他又给了我新的惊喜,那就是他和同学黄德海君在《上海文化》“本刊观察”专栏每期撰写的当代作家新作评论。其实说惊喜还不够,应该说是被他们两位小小地震撼了。这十多年我们已经看惯了格式完备、架势十足但多半装腔作势、左顾右盼、文笔板滞、观点模糊、平庸怯懦、不知所云甚至谬论公行的“学院派”文学批评,可悲的是我们自己也身在学院,竟毫无办法,还以为将来的批评恐怕也就只能朝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了呢,突然读到定浩、德海的文章,精神不禁为之一振。他们两位也受过学院熏陶,行

文中也有一些不尽高明的掉书袋的地方,但毕竟少了一些上述“学院派”的批评腔调。他们观点鲜明,绝不吞吐曲折,力求“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只是因为批评的对象常常乏善可陈,所以不满、挑剔、揶揄甚至气愤的时候还是居多。但这更对我胃口,所以几乎每期必看,而且发现他们开笔之后就一发不可收,《上海文化》“本刊观察”显然已不够他们驰骋,所以经常还可以在外地报刊上看到他们的文风更活泼观点更犀利而对象也不再限于“新作”的评论文章,更觉欣然有喜。

一开始还以为这只是我个人偏好,很快发现原来他们早就被许多圈内人士关注、认可、欣赏了。一头扎进“明清之际”而很久不写评论文章的赵园女士有次来复旦讲学,特别提到并不在场的他们两位,激赏不已。在他们的部分评论文章终于收入陈思和先生主编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第二套即将出版,这说明对文学批评的现状虽然众说纷纭,但大家心里还是明白的,还没有真的恶化到良莠不分的地步。我不仅为他们两位感到高兴,不仅佩服吴亮当初发现、起用和培养新人的气派与眼光,也因此对文学界的“公议”不再完全没有信心了。

一位作家朋友抱怨说,创作是赔钱买卖,评论则容易名利双收,证据是他的大学同学凡写小说的都籍籍无